

《生活在北京的巨华赤子》系列

我与“6月18日” 朱启强(上)

《生活在北京的巨华赤子》系列

我与“6月18日”巨华校友：朱启强(广州)

“6月18日”是个平凡的日子，然而，这个日子却与我一生结缘。

1953年6月18日，我随家人离开出生地印尼巨港乘船回国。那一年我9岁，刚在巨华第八小学念完四年级。1962年6月18日，我穿上军装乘坐火车离开广州，开始了长达16年的军旅生活。那一年我18岁，刚领到高中毕业证书。

两次“6月18日”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成为我人生重要的转折点。从此，每年“6月18日”便成为我除了生日以外的重要日子。这一

天，我心中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感觉，默默浮现起当年的点点滴滴……

(一)

从我记事起，我的家就是一个大家庭。听家人说，在我伯父朱陈寿21岁、父亲朱陈明18岁时，两人一起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巨港谋生。开始在一家金店当学徒，出师后过了几年，兄弟俩便合伙自己开了家金店“东华隆”。随后是分别回乡结婚、生子，再随后把家人都接到南洋生活。我的许多兄弟姐妹和我都是在印尼出生的。

然而，就在我出生前后一年，伯父、母不幸相继去世。留下的堂兄堂姐除了3

位堂姐出嫁以外，其余6位便和我们一起生活了。这样，连同我的亲兄弟姐妹，一家子十多人，济济一堂，颇为热闹。

我和弟妹尚小，与其说是父母养大，不如说是在众多哥哥、姐姐们的呵护下长大。记得我5岁那年，第一天上学就是堂姐朱美芳带着去学校报名的；大姐朱锦霞带我去照相馆照了有生以来第一张“学生标准照”；四堂姐朱焕章更是我上巨华第一小学时的老师，对于她我除了感受到姐弟的温情，还带有对师长的敬畏感。记得我沾了她当教师的光，每天得以免费乘校车上学……

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听说中国解放了，父母亲便动了

回国之心。一是一大家子在海外只靠父亲赚钱养家生活，没有安定感；再是孩子大了要上更高一级学校念书。于是，从1950年开始便有计划地分三批回国。先是1950年底四堂姐朱焕章乘飞机回国；再是1952年大姐朱锦霞带着我的两位哥哥乘“芝利华”轮回国；又过了一年，1953年6月18日我随家人最后一批离开。这次连父母亲总共11人，光是行李就装了21个大木箱。记得我们是下午三点左右在巨港码头登的“万福士”轮，当时感觉船很大、很高，实际上只是五千吨船，还比不上上年霞姐他们乘坐的“芝利华”万吨轮。

那一天，码头挤满了送行的亲友，有

锡叔，大堂姐、二堂姐、三堂姐各家……。我倚在船舷发现他们频频仰头寻望着我们，默默地拿手绢擦拭眼泪。我是第一次乘大船出海，只是感到特别新奇和兴奋，并未理解亲友们的心情。长大后看到这些旧照片，想到那一天和锡叔、大堂姐、二堂姐、三堂姐的离别竟是最后的诀别，心中不禁隐隐作疼！

我们乘坐的“万福士”船驶离巨港后，在6月23日停靠棉兰市码头。那天，船上的旅客突然一阵骚动，我的大堂哥朱启乾本来躺在船舱看书，好像听到什么一跃而起，连身上的睡衣也没换就冲上了甲板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是中国驻印尼棉兰的领事沈一平亲



1953年在回中国的轮船甲板上



归国同学在船甲板上
与驻棉兰沈一平总领事合影